



新时代以来，在真实亲诚对非政策理念引领下，中非合作持续深入发展。在2024年9月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中国同所有非洲建交国的双边关系提升到战略关系层面，中非关系整体定位提升至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并宣布中方未来3年同非方开展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为中非合作树立了新的里程碑，进一步推动中非经贸合作战略升级，打造全球价值链合作新范式。

中非经贸合作双向赋能

中非经贸合作优势互补，近年来在贸易、基础设施合作、投资、产业链发展等领域均取得新的进展与重大成果。贸易产品双向流通。2024年中非贸易额达到2956亿美元，同比增长4.8%，再创历史新高。其中，中国自非洲进口1168亿美元，增长6.9%，对非洲出口1788亿美元，增长3.5%。中国已连续16年保持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中国对非出口产品技术含量提升，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对非出口不断增加，尤其近年来对非出口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快速增长，有力支持了非洲绿色能源转型。基建项目促进互联互通。非洲是中国仅次于亚洲的第二大承包工程市场，2013年到2023年，中国企业在非签署承包工程合同额累计超过8000亿美元，完成营业额超5000亿美元。中国企业在交通、电力、通信、水利等领域承建了一大批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项目，为非洲促进互联互通、改善产业发展基础和生活条件作出了积极贡献。产业园区集群发展。中国企业到非洲国家投资的重要平台，促进了产业集群的构建，为当地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和税收收入。投资合作升级产业链。中国企业积极参与非洲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强各领域产业合作，推动非洲产业链的构建与升级。习近平主席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提出中方愿同非方打造产业合作增长圈，将进一步推动中国企业抱



王雪坤

团出海，在非洲不同次区域统筹构建上下游产业链。

中非经贸合作战略升级

中非经贸合作在合作理念、合作领域、合作模式、合作机制层面不断升级，推动中非经贸合作深度广度不断拓展，有力促进了中非共同繁荣。推动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不断升级合作理念。中非从来就是命运共同体，发展同非洲国家的团结合作是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基石。中国作为全球南方的一员，愿意与非洲分享国家建设发展和实现现代化的经验，受到非洲国家的热烈欢迎，中非在探索符合各自国情的发展道路上相互支持。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出访非洲时即提出中非命运共同体理念。在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共筑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在2021年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上进一步提出“推动构建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在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则将“中非关系整体定位提升至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不断升级，为基于优势互补的中非经贸合作提供了理念指引，明确了发展目标和方向。

拓展新兴产业合作，丰富合作领域。近年来，伴随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非在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生物医药、金融等新兴领域的合作不断加强。在绿色发展方面，中国积极参与非洲太阳能、风力、小水电、地热等清洁电力项目的建设，设立中非绿色产业链专项资金，推动非洲国家能源转型，助力非洲应对气候变化。中国企业承建的摩洛哥努奥三期光热电站、肯尼亚索西安地热电站、埃及苏伊士湾风电项目等有力提升了所在国的清洁能源使用。在数字经济方面，中国企业积极布局非洲市场，持续推进电子商务、移动支付、智慧城市、大数据等领域的合作，以数智助推非洲发展。强化双向赋能，创新合作模式。随着双方交往持续深化，中国企业不断探索新的对非合作模式，寻求新的合作增长点，促进中非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在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建设中，启动对非新型易货贸易试点，积极探索产贸联动、投资联动、物贸联动示范项目，推动贸易、投资、产业共同发展，先行先试对非合作的新路径和新模式。在基础设施建设上，中国工程承包企业开始采用建设—经营—转让（BOT）、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国际多方合作等模式深度参与非洲基础设施项目运营，

逐步建立基建领域的全产业链综合服务体系，促进项目可持续发展。加强多边区域协同，持续完善合作机制。除双边合作框架和机制外，中国积极拓展与非盟等区域组织及多边组织的合作，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合作机制。中非合作论坛中国与非洲开展集体对话和务实合作提供了平台。在论坛机制下，中国近年来相继宣布了“十大合作计划”“八大行动”“九项工程”“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非经贸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不断加强同非洲区域组织的沟通合作，积极支持非盟、非洲大陆自贸区和非洲疾控中心的建设，助力非洲区域一体化发展。此外，中国成立中国—非洲（埃塞俄比亚）—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合作示范中心，建立中国—世界银行伙伴关系基金，加强与多边机构合作，共同支持非洲国家包容和可持续发展，为经贸合作创造更好合作环境。

全球价值链合作新范式

面对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中非共同倡导多边主义和贸易自由化，从建立经贸合作规则、构建优势产业、支持工业绿色转型、搭建物流网络等开展宽领域合作，积极打造全球南方

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合作的新范式。

推动开放合作，建立新型经贸合作规则。尽管遭遇逆流阻力，全球化仍然是大势所趋，开放合作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最优之路。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开放合作符合中非的发展利益，双方共同倡导多边主义，共同支持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在对非合作中，中国积极承担大国责任，主动扩大单边开放，给予包括33个非洲国家在内的所有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100%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成为实施这一举措的首个发展中大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国已同20多个非洲国家签署了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协议，正推动进一步扩大协定商签范围，共商构建符合中非共同利益的新型经贸合作规则，推动制度创新，为中非经贸合作提供长期、稳定、可预期的制度保障。

培育优势产业，助力非洲融入全球价值链。受制于自身经济发展水平，非洲目前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优势和所占份额不高，迫切期望通过吸引投资加快工业化进程，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非洲部分关键矿产的产量和储量在全球占据重要地位，随着全球能源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等产业快速发展，

非洲有潜力成为以矿业为核心的全球能源转型支点。非洲人口增长速度快，年轻人口占比高，在数字经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等领域具有较大发展空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25—2027）》中提出，支持非洲本地价值链建设、制造业发展和关键矿产深加工，将继续强化产能合作，依托非洲资源和要素禀赋，助力非洲国家建设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打造跨区域物流枢纽，夯实非洲现代化内生动能。基础设施和跨区域物流网络建设滞后是非洲制造业发展缓慢、难以融入全球价值链的主要阻碍之一。为此，非盟提出“非洲基础设施发展计划（PIDA）”，着力推进非洲设施和物流互联互通。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依然保持较强的比较优势，可继续与非洲国家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鼓励企业以市场化方式参与包括陆上交通、海上航线和航空运输在内的中非物流联通合作，充分发挥相关金融机构的融资支持作用，创新融资模式，为非洲互联互通提供助力，支撑非洲有效提升在世界经济和国际合作中的地位。

支持工业绿色转型，引领可持续发展。非洲是全球受气候变化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实现绿色低碳发展是非洲国家的普遍共识。在工业领域，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正出台工业绿色增长计划，通过激励政策促进投资流向绿色低碳产业。中国在绿色转型发展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绿色技术、产品和经验，可进一步推进与非洲的绿色发展合作，通过建设低碳示范区，扩大对非洲清洁能源、节能技术、高新技术产业、绿色低碳产业等的投资规模，开展绿色发展能力建设，助力非洲国家优化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走绿色发展道路。

（作者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



俞海

近年来，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荒漠化加剧、极端气候事件频发，给人类生存和发展带来严峻挑战。2024年，地球经历了北半球历史上最炎热的夏季，全球多个地区遭遇极端高温天气。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种新旧问题与复杂矛盾叠加碰撞、交织发酵。全球环境治理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是关乎人类永续发展的时代课题。

全球环境治理的现实困境

绿色政治共识弱化与制度框架失灵。1972年6月，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通过《人类环境宣言》，开启了全球环境治理的新篇章。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21世纪议程》《里约宣言》等重要文件，确立了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理念，大会框架下的三大环境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即“里约三公约”），成为全球环境治理框架的基石。此后，国际社会逐步形成了以全球可持续发展为共识、以联合国公约及其相关机构为中心的全球环境治理合作框架。近年来，世界经济低迷，新冠疫情加剧了这一形势，国际社会将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放在更加优先的位置。以美国和欧盟为例，特朗普上任后，“美国优先”政策高调回归并进一步加强，再次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削弱了全球减排框架的约束力。欧盟受地缘政治变化、经济不景气等诸多因素影响，绿色进程遭遇多方面挑战，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战略收缩可能无法避免。国际社会虽已深刻认识到全球环境危机，但绿色政治共识弱化趋势已初步显现，全球环境治理制度框架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

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极化冲击治理基础。当前极化表现为权力结构向少数大国集中，美欧日等少数西方发达国家凭借技术优势主导低碳规则制定，而碳排放量仍在上升的新兴经济体却缺少话语权；合作机制呈现碎片化特征，如美欧“气候俱乐部”以排他性标准割裂多边体系，削弱《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权威；南北差

距持续扩大，发达国家人均碳排放量远超发展中国家，却忽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全球环境治理基础在于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治理框架，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支持承诺，以及各国对环境问题全球性的共识。而极化使得发达国家通过技术垄断与资金壁垒破坏制度公平，“小圈子”合作割裂多边机制有效性，南北资源分配失衡激化减排责任争议，导致发展中国家因能力不足难以履约，削弱全球合作信任，使碳中和目标面临承诺与行动脱节的深层危机。

行为主体博弈加剧治理无序化。全球环境治理中的行为主体博弈加剧了治理体系的无序化。一方面，受经济形势、地缘政治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发达经济体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领导力和意愿在持续减弱，履行对外援助义务落实不到位，削弱全球治理框架约束力。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诉求不断增强，特别是那些受气候变化影响较大的国家，对发达国家提供资金与技术的需求更为强烈，但受自身话语权不足等因素影响，自身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此外，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正在阻碍全球环境合作，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等机构协调全球集体行动体系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加之多边机制呈现日趋增多而复杂的趋势，治理体系表现出碎片化特征，多边环境治理进程变得更为艰难。

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环境治理中面临的挑战

发展与减排的双重压力。当前，新兴经济体面临发展经济、应对气候变化、治理环境污染等多重挑战。发展经济仍是新兴经济体的核心优先事项，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驱动其对传统能源、水资源、矿产资源等需求刚性增长的同时，亦使其面临资源耗竭、环境污染等问题。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还面临着国际社会特别是发达经济体要求其承担更大减排义务的履约压力。新兴经济体需持续提升全球环境治理影响力和话语权以维护其发展权益，然而其经济增长需求与国际减排压力间的冲突，使得其发展路径转型的紧迫性持续升级。

内部协调与治理效能短板。发展经济和环境治理是新兴经济体必须统筹的双重任务。在资源约束条件下，如何平衡发展与保护的关系是新兴经济体的核心关切。但部分新兴经济体受制于内部体制束缚、利益团体博弈等因素，导致环境治理进程受阻。更为突出的是，有些新兴经济体自身治理效能存在较大短板，主要表现在政府行政效率低下、政策执行不到位、环境治理技术储备不足等方面，这些已成为其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主要障碍。

技术依赖与规则博弈的被动处境。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环境治理中面临发达国家的技术垄断与规则主导双重挤压。一方面，低碳技术供应链被美欧日等掌控，如光伏逆变器核心芯片、碳捕集技术专利大部分由发达国家企业持有，新兴经济体每年需支付巨额技术许可费，自主创新能力薄弱导致减排成本高企。另一方面，发达国家通过“碳关税”“绿色标准”等非关税壁垒构筑规则优势，如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要求进口商品提交部分环节的碳排放数据，新兴经济体出口企业因检测认证成本增加面临直接的利润损失。此外，全球气候治理议程设定权长期被发达国家主导，《巴黎协定》后续细则谈判中，发达国家刻意淡化“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将更多减排压力转移至新兴经济体，而在气候资金承诺和技术转让方面却进展迟缓，导致新兴经济体在治理参与中陷入“规则被动接受—成本被迫承担”的恶性循环，难以有效平衡发展权益与环境责任。

中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战略作为

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贡献者。从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视角来看，中国用实际行动为建设清洁美丽世界作出了突出贡献。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中国宣布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作出更大贡献。中国言必信、行必果，是气候治理的行动派，克服经济社会发展种种困难，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成为全球能耗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2013—2023

年，中国煤炭消费比重累计下降12.1个百分点，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累计提高7.7个百分点。建成世界上最大的清洁能源电力供应体系，绿色技术、绿色产品丰富了全球供给，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绿色转型作出巨大贡献。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在20个“爱知目标”中，中国在设立陆地自然保护区、恢复和保障重要生态系统服务、增加生态系统的复原力和碳储量等3个目标进展超越预期，13个目标取得关键性进展，4个目标取得阶段性成绩，执行总体情况好于全球平均水平。荒漠化防治方面，在全球率先实现了土地退化“零增长”、荒漠化和沙化土地“双缩减”。“三北”工程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授予“全球500佳”奖章，《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两次授予我国“防治荒漠化杰出贡献奖”，称赞“世界荒漠化防治看中国”。

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的维护者。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秉持“授人以渔”理念，借助“一带一路”“南南合作”等多边合作机制，尽己所能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环境治理能力。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中国持续通过合作建设低碳示范区、实施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项目、开展能力建设培训等方式，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小岛屿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和非洲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支持。截至2024年10月，已与42个发展中国家签署53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谅解备忘录，开展近百个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项目，累计实施300多期气候变化相关领域的能力建设项目，为120多个发展中国家提供1万余人次培训名额。高度重视发展中国家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切，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强调发达国家应正视其历史责任，率先行动大幅减排，并切实兑现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持。在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在南南合作框架下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超80个国家受益；宣布率先出资15亿元人民币，成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六次缔约方大会（COP16）期间宣布首批支持9个小额项目，为6大洲15个发展中国家的生物多样性治理提供无偿资助，目前正在开展第二批项目的遴选工作。在荒漠化防治领域，开拓“一带一路”防治荒漠化合作机制，成立中阿、中蒙荒漠化防治中

心，在蒙古、中亚、非洲等地建立防沙治沙示范基地，与发展中国家分享技术和经验。

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推动者”。作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中国坚定践行多边主义，努力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中国积极引领气候变化国际谈判，通过领导人气候外交增强全球气候治理凝聚力，倡议二十国集团发表了首份气候变化问题主席声明，推动达成并率先签署《巴黎协定》，以中国理念和实践引领全球气候治理新格局。在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为全球气候治理之路蒙上阴影之时，中国则表明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和行动一以贯之的态度，坚定不移维护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为国际社会全面有效落实《巴黎协定》注入强大动力。作为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主席国，中国协调绝大多数国家的利益和立场，引领推动达成“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昆蒙框架”）等一揽子务实平衡且具变革性的决定，历史性地点确定了“3030”目标，决定设立“昆蒙框架”基金，并纳入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DSI）的落地路径，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擘画了新蓝图。为凝聚落实“昆蒙框架”共识，联合相关缔约方、国际组织牵头发起“昆蒙框架”实施倡议，截至2024年10月，已得到26个缔约方及相关国际组织响应。COP16期间，中国针对《生物多样性公约》资金机制提出分步走的新渐进式改革方案，推动南北双方达成一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英格·安德森曾表示，中国在推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表现是“非凡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全球环境治理需要各方持续坚韧努力。中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全球环境治理中作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面对全球环境治理困境，国际社会要以前所未有的雄心和行动，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破解时代难题，推进人类可持续发展。

（作者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